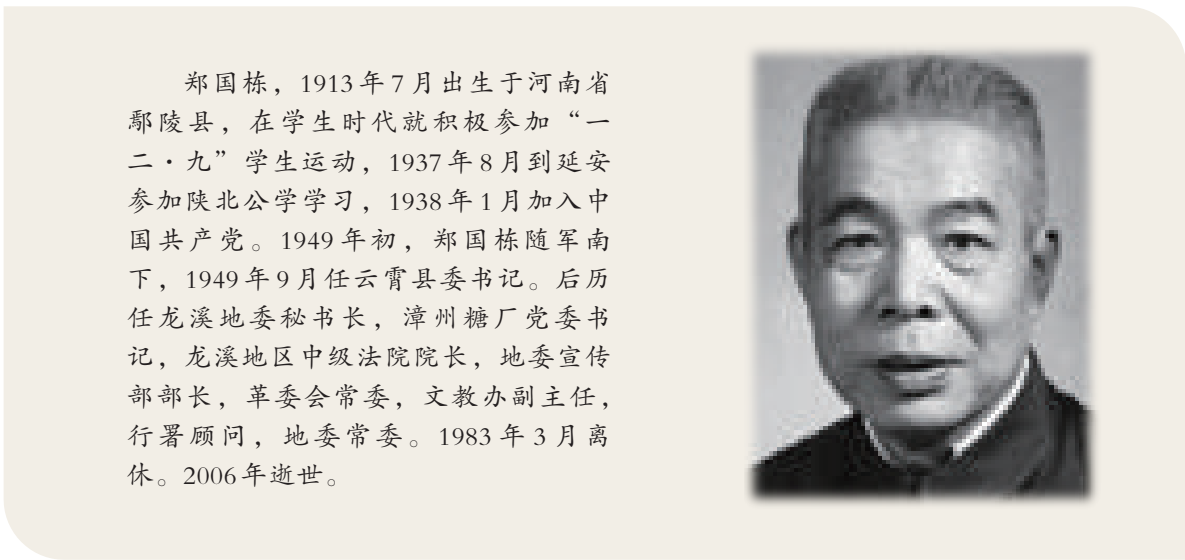


要大伙都叫他“郑同志”

福建省云霄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郑国栋



有这样一位前辈，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对待同事朋友平易近人；他在职时在多个岗位作出了贡献，离休后依然发挥余热，参与到地方党史的征集研究中来；他不爱别人称呼官衔，而是要大伙儿叫他“郑同志”，这样听起来更加亲切。他就是祖籍河南郾陵，于1949年10月至1952年8月在福建省云霄县担任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县委书记的郑国栋。

云霄和平解放

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曾一石是一位老党史工作者，听到我们要了解郑国栋的生平事迹，他说：“你们放心，只要我们手头有的资料，一定都提供给你们。另外，你们最好抽空去采访一下郑国栋的女儿郑红闽，还有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方，陈方曾经和郑国栋共事过一段时间，情况多少会了解一些。”

从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1949年10月2日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云霄县工作委员会，郑国栋为书记，接替原中共云和诏县委在云霄的领导工作。县工委领导人由上级任命，实行全委制，隶属福建省第六地委，1949年11月至1950年9月隶属漳州地委，1950年9月隶属龙溪地委。1954年7月起，全委制改为常委制。

1949年8月17日，福建福州解放后，解放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9月初，龙岩解放；9月19日，漳州解放；9月20日前后，平和、南靖也相继和平解放。云霄是和平解放还是武力攻打？这是摆在云和诏县委面前的重大问题。

当时，云霄的反动势力，除了反动政权、县自卫团和警察局以外，还驻有省保安一团胡季宽的部队。我党立即加紧做好重点人物的统战工作。第一个对象便是农会理事长许桂芳以及警察局局长张启

圣。许桂芳多年来倾向我们党，此时已是主和派，我党地下工作组把问题摊开以后，他便答应暗中起义，愿去做张启圣和自卫团副团长吴荣贵的工作。

汤精义是云霄籍在外地的一位国民党高官，与许桂芳有亲戚关系。工作组通过许桂芳利用汤精义回家乡探亲的机会，多次做他的工作。汤精义表示愿以家乡父老为重，愿意无条件归顺共产党。有了这个有利关系，工作组便依照县委的意见，通过许桂芳和汤精义去做国民党云霄县长汤涛和其他上层人物的工作。

1949年9月14日，张大目等人带着汤维奇等干部下山到世坂，与许桂芳、张启圣、吴荣贵等谈判和平解放云霄的有关问题。9月28日，吴扬电令汤维奇于9月29日上午到世坂会见三十一军前哨部队参谋李森。中午，地下工作组派张荣三、张继川随同李森到莆中村同刚到任的云霄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郑国栋、县长石瑞汇报云霄和平解放的前后情况。

1949年10月1日，南下大军第三十一军侦察营、第八支队十九团和长江支队第五大队第一中队的南下干部在郑国栋、石瑞的带领下进入云霄县城，云霄和平解放了。

团结就是力量

曾一石介绍说，自己通过调查走访、查阅资料发现，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郑国栋在干部工作中比较注意处理好南下干部同当地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同工农干部之间的关系，注意防止和克服干部工作中“左”的情绪。在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关系方面，郑国栋比较注意引导南下干部重视团结，尊重从游击队来的同志和地方干部，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提高他们的工作水平，调动工作积极性。比如，在县委领导班子中，郑国栋非常尊重张大目同志。张大目虽然文化水平不

高，但对党忠诚，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熟悉地方情况，和群众关系密切，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因此在研究组建县委领导班子时，郑国栋特地地向地委推荐其为领导成员。由于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县委一班人团结战斗，关系融洽。县区从各方面来的干部，也都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各方面工作开展顺利。

郑国栋是个细心的人。在日常工作中，他还特别意识到，云霄是和平解放的，所以在工作中坚持以党员为主体，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注意团结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有进步倾向的地方人士及知识分子。他认为，对这些同志团结使用得好，不但能更广泛地团结各阶层人民，稳定人心、稳定社会，而且可以发挥他们在文化科技知识及业务上的专长，在工商、文教、卫生和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作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郑国栋按照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耐心认真做好他们的工作，使这部分人在新中国作出了新的贡献。

真正公私分明

郑国栋的女婿董中州，今年63岁，祖籍四川，1969年在福建长泰县上山下乡，1971年到兵工厂工作，1982年回到漳州。父亲跟岳父都是革命同志。谈到岳父郑国栋，老董说：“岳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子女要求很严格，从不为子女的事找人，自己生活也节俭。”说话间，

从房间里走出一位着装朴素、面带微笑的阿姨，她走过来向我们打招呼，老董介绍说，这就是他爱人郑红闽。

说起父亲，郑红闽眼圈红了，她对记者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父亲：“父亲工作非常认真，一忙起来往往顾不上家，也很少回家。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公私分明。当时单位配一辆自行车给他用，有时儿女们想借用一下都不肯，还被严厉批评道：这是公家单位配给我工作用的，你们怎么可以用。”儿女们在郑国栋的言传身教下，都以父亲为楷模，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而努力地工作。郑红闽说：“我们兄弟姐妹6个，工作都是自己找的，父亲从不出面找人帮我们安排工作，我弟弟郑重阳从部队回到地方，单位也是自己找的。”

郑红闽缓缓地说：“父亲离休后，经常有很多原来的同事及农民朋友来看望他，他经常帮助困难群众解决问题，还把自己的工资和口粮资助困难群众。到现在，父亲都去世这么多年了，原来生前的朋友还经常来看望我们。”

告别郑红闽时，她站在楼梯口与我们道别，还一再代说，如果报纸出来了，一定多拿几份给她，她要珍藏起来，还要拿给其他几个兄弟姐妹看。

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方说，郑国栋离休后，积极参与漳州市党史征集委员会、漳州市党史征集顾问组工作，自己带头撰写文章，帮助老同志整理回忆录。在编辑《青山不老》这本书时，里面的一篇文章是由陈方采写的，陈方写好后拿给郑国栋看，郑国栋从头到尾看了四遍，每次都有修改。最后一次审阅时，恰巧郑国栋要到医院检查身体，那时他的视力已经很差了，还忍着病痛坚持看完材料才去医院。他就是这样，从文章标题到史实回忆，都力求完美。

“总而言之，郑国栋人很好，特别平易近人，大事讲原则，小事讲灵活，是位好党员，好县委书记。”陈方说，郑国栋不喜欢别人叫他官衔，而是要大伙叫他“郑同志”，不管他在哪个岗位，这一称呼陪伴了他60多年。

（摘自2011年10月10日《中国县域经济报》，作者黄长秋、朱亚圣）



我今年95岁了，是一个有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些年，让我印象深刻。

江西省莲花县是个国家级贫困县。1957年，我和丈夫甘祖昌回到莲花县坊楼公社沿背大队就是想带领村民一起脱贫致富。前些年，由于年龄原因，孩子们把我从老家接到县城，但我一直惦记着沿背村。令我欣慰的是，孩子不时给我带回好消息。前段时间，女儿甘公荣去沿背村走访贫困群众，回来后她告诉我，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里以前晴天灰尘冲天、雨天泥泞不堪的弯曲小道变成了笔直干净的柏油路，破烂的牛栏猪舍厕所等都改成了水冲厕所，房前屋后也种上了绿油油的井冈蜜柚。女儿说，这是受惠于党中央搞的精准扶贫，现在不光是沿背村，全县的贫困村都在发生这样的变化。听到这些消息，我感到欣慰。我虽然年纪大了、力不从心了，但党中央的好政策实现了我和祖昌的心愿。

2012年底，我通过《新闻联播》看到党中央制定了八项规定，觉得很好很及时。2013年春节，在单位上班的外孙告诉我，过节期间，公车必须封存在车库里，而且纪委还检查。这之后，我听说县里对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娱乐等事情查得越来越严了，连我的手机也收到欢迎举报这些现象的短信。我认为这个办法非常好，毛主席讲过，只有发动群众的力量，我们才能不断取得胜利。

管起来，就与以前不一样。这几年春节，有不少人来看我，其中既有下岗工人，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家人炒几个

延安时期的好作风

□ 龚全珍（口述） 李小斌（整理）

莱留他们吃饭，可他们都委婉拒绝，说：“在外面吃饭不习惯，家人还等着我们回去呢”。听女儿说，为了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不少干部不仅吃住在贫困村，还千方百计地帮助乡亲们在网上卖菜籽油、醋姜、黄泥咸鸭蛋、自制香辣小鱼干、杨梅干等特色农产品。我非常高兴，干部不讲架子，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了，延安时期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摘自2017年第20期《中国纪检监察》，原标题为《龚全珍：延安时期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一条军毯见证的荣耀

□ 杨珏 伏沼竹

在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白崖台乡的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里，一条军用毛毯静静地躺在展柜里。然而，就是在这样一条不起眼的军毯前，不少观众驻足，聆听着讲解员讲述这条军毯背后的故事。

这条军毯的主人叫杨勇。1937年，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在灵丘县白崖台乡乔沟一线峡谷公路中打响，其中最惨烈的一战在白崖台村老爷庙展开。战斗中，115师686团副团长杨勇带领战士们老爷庙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肉搏，刀、枪、拳、牙都成了武器。尽管已夺得阵地，但日军在飞机掩护下不断向老爷庙发起反扑，杨勇和营长邓克明先后负伤。

最终，八路军取得了全面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首次大捷。“平型关大捷，创造了抗日战争初期我军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李彪说。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八路军的衣服、武器等很多军需物资都是靠打了胜仗补充的。在缴获的

日军战利品中，有1000多条军毯。经师领导决定，凡是在后方医院疗伤的伤病员每人一条军毯，负伤的杨勇也分得一条。

就这样，这条土黄色的军毯陪伴杨勇整整15年，和他一起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这条军毯是平型关大捷的战利品，今天我把它交给你，送给灵丘人民。”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凯旋时，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杨勇上将把这条军毯交给灵丘籍的司令部机要参谋武锦时，深情地对他说：“八路军在平型关的胜利来之不易，不少同志流血牺牲，灵丘的群众为部队带路，运送伤员，搬运物资，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请你回去替我问候灵丘的老乡们。”

如今，杨勇将军的这条军毯被整齐地摆放在纪念馆的展柜里。而杨勇将军在把军毯交给武锦时的一番话语，更是军民鱼水情深的长久见证。

（摘自2021年2月3日《光明日报》）



我搞新闻报道也有20多年了，采访过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很多。而那次采访“渡江女英雄”马毛姐，却让我烙印在心。

电影《渡江侦察记》中有个十分精彩的镜头：一条木船离岸而去，这时一个小姑娘将长长的竹篙在江中一点，身轻如燕般腾起，然后稳稳地落在船头。这并不是编导凭空想象的情节，而是历史上真实的一幕。这位小姑娘的原型，就是被誉为“渡江女英雄”的马毛姐。

毛主席亲自给她起名“马毛姐”

□ 唐虎

了，我每次到部队作报告都格外激动，就是平时上街偶尔看到军人都想多看几眼，总感到格外亲！”

马毛姐告诉我，她1935年生于无为马家坝，在家排行老三，没有正式的名字，村上人就叫她“马三姐”。1949年春天，解放军征用民船，准备过江。她第一个报了名，并且第一个报名参加渡江训练，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船。4月20日晚，长江风平浪静，解放军开始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摧毁性打击。当时，有4条船组成突击队，担负先锋任务。部队领导考虑到马三姐的安全，决定不让她参加渡江战斗，马三姐感到特别委屈，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眼看一条条船离开岸边，马三姐心急如焚，决心已定，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就在最后一条突击船离开岸边一丈多远的时候，马三

姐撑起竹篙，飞身上船。恰巧，这条小船就是她自己家的，掌舵人正是她的哥哥。小船载着30名解放军，向对岸芜湖进发。

小船刚到江心，就被江对岸的敌军发现。枪炮轮番轰击，子弹炮弹如雨，疯狂袭击突击船。火光中，解放军两条突击船被炸飞。面对死亡，马三姐面无惧色。为加快行驶速度，马三姐换下哥哥：“哥，你力气大，你跟解放军一道划桨，我来掌舵！”

小船顶着枪林弹雨，第一个抢滩登陆。这就是被载入辉煌史册的“渡江第一船”！

马三姐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新中国领袖没有忘记她。

小，家里人没有让她去京。

1951年，毛主席再次邀请马三姐作为英雄代表参加国庆庆典。这一次，家里人同意了。10月3日，中央首长请代表们看戏，马三姐荣幸地被安排坐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中间。4日，毛主席专门派车把马三姐接到中南海家中，请她吃家宴。当得知马三姐至今还没有自己的正式名字时，毛主席说：“我给你取个名字吧，你姓马，我姓毛，你就叫马毛姐吧。”临走，毛主席还送给她一个笔记本，并在扉页上题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毛泽东，一九五一年十月四日。”从此，马三姐才真正有了个属于自己的名字——马毛姐。谈起往事，马毛姐百感交集，饱含热泪。她动情地对我说：“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马毛姐还告诉我，那次她从北京回来，先后在炳辉子弟学校、工农速成中学和干部子弟学校等3所学校读书，加起来有7年时间。1957年毕业后，马毛姐被分配到合肥车站区麻纺厂当车间主任。这之后，她工作多次调动，但不管到哪儿，无论什么岗位，她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就是到了晚年，马毛姐也没闲着，一直在发挥余热，每年给大中小学校和部队作报告都在10次以上。她说：“我所做的一切没有别的心思，就是一句话‘报党恩’，没有党，哪来今天的幸福生活？”马毛姐没因自己是“渡江女英雄”而居功自傲，她为人谦逊，作事迹报告没有讲稿，时不时还冒出几句家乡话，语言朴实无华，事迹生动感人。每次报告，听众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摘自2015年第1期《军事记者》）

